由于本书关注的焦点全放在了宋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作者旨在全面剖析宋朝财政的历史发展与具体细节，而没有留意纵向的对比，即将天水一朝的经济放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至少是与几个有代表性的历史阶段进行比较，对宋代的财政状况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对宋代经济的历史地位才能有更清晰的认识。不过即使未能做到这一点，也不算是本书的缺陷，只是倘若能有所补足，无疑锦上添花。

第二编“两宋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和第三编“宋朝财政的管理体系与设施”作者都对史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数据的收集、信息的整理做的很详尽，因此篇幅很长，内容很细。笔者尚未来得及一一细读，一下仅是就第一编，“两宋财政发展史概述”部分的分析与所得。

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编“国家形成”部分，王国斌提到了推动执政者去调整所管理的政治实体的政策乃至政治形态的挑战，也即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外部动力问题，近代工业化的发生与经济增长的实现，也相当程度上是作为政治实体单元的国家为了应对竞争性或生存性的挑战而做出的应对之举。这也就是说，近代化与近代化的消极性动力息息相关。

对于宋代来说，理解北宋时期的两次变法的最重要的消极性动力，即需要从财政上入手，财政问题也处在改革者心中的核心位置。宋代仁宗朝开始危机初露的财政困窘，其直接的原因，冗兵、冗官、冗费所导致的国家支出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一点已经被古往今来的学者所熟知了。但这“三冗”为何在宋朝尤为突出，几于宋代的文化成就一道，“独步”于前现代的中国，笔者还未能见到充分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对此，笔者与一个尚不太有把握，还需留待检验的想法，这“三冗”之中，已经有着部分某种“近代性”的因素存在，正是这种“近代性”的超时代特征，使得入不敷出，为古典时期的中国所不能承受。

范希文的“庆历新政”，在财政政策上的主要方针还是裁减经费，走的是节流的路。而到了王介甫，其变法的核心思想，用现代的概念来说，就是对经济的可增长性的肯定和应用。可以说，这既是王荆公眼光独到，卓然于世人之所在，也是变法不得不失败的客观根由。在人类文明的古典时期（前工业化时期），北宋已然在经济的发展上达到了顶峰（至于相较于其他时代究竟差距如何，这个结论是否完全可靠，由于本书的分析止步于宋代，尚不能得出最终结论），即使是中央对国家财富的集中程度，也算得上首屈一指。在如此条件下，荆公所要追求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类似于所谓的突破“斯密式增长”。黄仁宇在变法失败的分析上眼光独到，看出了介甫已然初步有了近代人的思维，但对于时代的限制，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却不大准确。应当说，近代经济增长直接来源于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得益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此生产力水平下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金融体系。黄氏的见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介甫所处的时代，客观的条件确确实实不允许宋代的中国迈出这样一大步。但显然，历史没有给中国以承受失败的条件。

除了变法的问题，从财政制度在元丰时期的调整，还可以看到相权的扩张，这又可以与皇权问题相联系，不过这就暂时不在此讨论了。